

本书编写组◎编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 研究报告选编 (2014)

Selected Decision-consulting Research Report
of 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2014)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本书编写组◎编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 研究报告选编 (2014)

Selected Decision-consulting Research Report
of 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2014)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研究报告选编. 2014/《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研究报告选编》编写组编. —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5150-1507-1

I. ①国… II. ①国… III. ①方针政策—研究报告—中国—2014
IV. ①D6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3723 号

书 名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研究报告选编(2014)

作 者 本书编写组

责任编辑 陈 科 陆 夏

出版发行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6 号 100089)

(010)68920640 68929037

<http://cbs.nsa.gov.cn>

编 辑 部 (010)6892876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1

字 数 412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50-1507-1

定 价 1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调换。联系电话:(010)68929022

目 录

中国梦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	1
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新变化与对策	33
全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84
2014 年中国宏观经济展望和政策建议	90
释放改革红利的重点领域和主要对策研究	103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基本思路及操作方案	118
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和法治型理政方式	136
文化体制改革研究	166
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网的对策研究	199
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研究	227
政社分开、社会组织培育和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研究	259

中国梦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

第一部分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基本价值研究

一、“中国梦”与中国现代化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要实现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核心内容,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基本内涵的“中国梦”^①。这一论断精辟概括了中国自近代以来百年探索和努力的奋斗目标,视野宽广,蕴含丰富,在学术界及社会各界引发了多重探讨。

在内在含义上,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梦”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内涵,尤其应以民族复兴作为“中国梦”的目标追求、动力导向和评价标准,^②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中国梦”的具体目标^③;在主要特色上,周显信等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比了“美国梦”与“中国梦”的不同特点,提出“中国梦”的社会主义特征;孙来斌等从东与西,今与昔,大与小几个角度,比较分析认为“中国梦”是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基石,包含了个体“小梦”的“大梦”^{④⑤};在实践途径上,李捷等从“中国梦”与

①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第1版。

② 黄艳,孙其昂:《“中国梦”的多维愿景:民族复兴》,《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年第4期。

③ 程美东,张学成:《当前“中国梦”研究述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2期。

④ 孙来斌,刘近:《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梦”多维透视》,《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年第4期。

⑤ 周显信,卞浩瑄:《“美国梦”的特色及其对“中国梦”的启示》,《探索》,2013年第2期。

“社会主义”关系的角度,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是“中国梦”实现的行动指南和根本保障。^①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普遍认可“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特征,认可“中国梦”就是中国人的现代化之梦,在“中国梦”的内涵和实现途径上形成了一定共识。

但是,对“中国梦”的研究总体上仍处于起步和初级阶段,研究内容较为单薄,理论的探讨松散且不够深入,亟待对理论体系构建进行深化和系统化的努力;对于“中国梦”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这一重要的理论问题,缺少应有的关注;对“中国梦”的价值内涵缺乏深入探讨,更缺乏以现代化“中国梦”为指引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形态、权力结构和政府角色进行全面审视与宏观把握。

“中国梦”的本质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表述。意识形态是整个社会思想体系的中心,价值观念则在意识形态内部占据了中心位置,在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起到主导和统领作用的就是核心价值体系。^②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一定的社会系统得以运转、一定的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依托。旧社会的解体往往以核心价值体系的崩溃为先声,新社会的诞生往往以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为先导,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也往往以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和完善为支撑。^③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从意识形态的高度,全面分析和把握“中国梦”的价值内涵,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是当前“中国梦”研究中亟待解决的任务。

基于上述讨论,本课题将以探讨“中国梦”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为核心内容,在深入阐释现代化“中国梦”价值内涵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中国梦”对中国社会形态和政治发展的要求。

二、中国社会现代性的根本特征与发展取向

1. “现代性”反思

检验近代以来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用一个简单的概念来概括就是“现代性、现代化或现代主义”。虽然一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这3个词的意思有不同看法,

① 李捷:《百年梦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② 杨明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论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③ 秋石:《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求是》,2006年第24期。

但在本课题分析框架下,我们基本认为三者所指的内涵一致,即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相对确定的历史时期。现代化是对整体发展进程的动态分析,现代性是对现代化进程的某一时间“节点”的静态分析,现代主义是指一个历史时期以来的一种文明发展态势。这一关于现代化的进程自1500年左右发端于欧洲,随后逐步影响到全世界,并影响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选择。^①

关于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定义有多种看法,我们较认同《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若斯的观点:“经济学家把现代化定义为人类逐步提高对外部环境的控制能力并利用它来提高人均产出的一个过程。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指出,现代化的其他特征包括:唤醒和激发大众对现在和未来生活的兴趣,认为人类生活是可以理解的而不受制于超自然的力量,以及直到目前才树立起的对科学和技术的信赖。”^②

欧洲国家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技术发展、建立资本主义企业制度、海外扩张和国家建设等初期现代化进程,开启了“现代性”的先河,到18、19世纪实现了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政治革命3大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革命,使西方成为现代化的楷模、现代性的标志,构成现代人类文明的基本“叙事框架”。“西方中心主义”从此占据“文明叙事”的中心位置,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明与否的基本标准,这种状况目前还在延续。

西方意义上“现代性”的展开从启蒙运动开始。按照康德1784年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的经典说法,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能“成熟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这种不成熟状态的表现就是对“权威”的臣服,无论这种权威是宗教性的还是世俗性的。因此,在康德看来,启蒙精神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理性;一个是批判性。康德认为问题不是人类缺乏理性,而是人类缺乏运用自己理性的勇气,当人类学会了“公共地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不屈从于任何权威,对历史与现实有了批判与反思的精神,启蒙就开始了,恢宏壮阔的现代性历史长卷就展开了。

对于现时代的人来说,现代性仍然是一个问题。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性是一项“未竟之业”。这就是说,现代性既是一个时期的人类文明史,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现代性还处于一个“现代化”的延续过程中,历史还没有“终结”,意识形态争论还在展开。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框架内,现代性理论是通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来表达的,现代性实践是通过技术化、商业化、工业化、城市化展现的,人的解放是通过自由民主制度实现的。因此,“后现代主义”者、法国哲学家利奥塔1979年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把现代性定义为“一种思想方式,一种表达

① 竹立家:《意识形态如何引领结构性改革方向——关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思考》,《学术前沿》,2012年第3期。

② [美]斯塔夫里阿若斯:《全球通史》,董书慧、王昶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9页。

方式,一种感受方式”。他认为现代性就是关于真理、人的解放、人的主体性等的“巨型叙事”“大叙事”或“元叙事”,而“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不信任”。

换句话说,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本质上就是对启蒙的一种反思与批判、对真理性知识的一种“解构”、对人的解放的一种怀疑、对科学的一种不信任。概言之,是对“现代性成果”的质疑。这就是说,“现代”与“后现代”的区别,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区别,也是一种历史社会的区别。虽然后现代主义在西方从来没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也没有提出像样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但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利奥塔、罗蒂、詹姆森、福柯、德里达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却挑起了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等方面对现代资本主义深刻的哲学反思。

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对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回应,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秉承古典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自由”的理念,坚持“自由优先于平等”“正义优先于效率”的自由主义教条。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30多年间,以哈耶克“市场自发秩序”和美国政治学家诺齐克“个人权利”的思想为基准,新自由主义价值指导原则成为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开始用真理性的“话语”讲话,并占据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舞台,几乎成为世界各国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其关于文明发展价值的理念渗透到全球各个角落,成为“现代性”的标杆,以至于美国新自由主义政治学家福山宣称近现代以来人类关于发展价值的意识形态争论“终结”,新自由主义成为文明未来发展的唯一正确的价值。

但2008年以后延续至今的世界经济危机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关于文明发展理念、发展路径、发展目的的意识形态争论远远没有“终结”,关于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又成了一个问题,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现代性”又陷入新的困境。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现代文明世界的迅速复兴,为文明世界提供了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现代性”选择的又一个“版本”,提供了人类文明发展价值、发展路径、发展目标的新理念。

社会主义基本理念,作为一种以制度支撑的“实践形态”,经过近100年的曲折发展之后,特别是经过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失败之后,曾陷入发展低潮和困境,但中国在全面检讨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之后,提出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发展路线,迅速改变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困境,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性”进一步显现,使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具有了世界意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全面、深入地总结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理论意蕴、价值内涵、实践路径、发展目标,形成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 and 实践框架,不仅对中国未来的“现代性”发展,而且对人类文明未来的“现代性”选择,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指导价值。

2. 现代化与全球化

全球化是近些年来被广泛讨论的一个话题。与全球化相关的议论林林总总、

汗牛充栋,但仔细梳理关于全球化的论点,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全球化与“现代性”或“现代化”概念紧密关联。在大多数有关全球化的论述中,全球化是指一种相互联系的复杂网络在全球范围的形成。全球化意味着相距遥远的社会中的人类生活被联结在一起,并在全球范围被组织起来;意味着人类行为活动相互影响的增强与加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社会、民族、国家、文明之间互动规模的递增与扩大。同时,在不同的观点对全球化的表述中,全球化也经常指一种过程、一种政策、一种市场战略、一种现代化走向,甚至一种文明发展困境、一种意识形态或一种思维方式。毫无疑问,全球化是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事实”,全球化的演变与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息息相关,有可能决定着地球整体文明的命运。

虽然全球化概念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在一些思想家的著作中被使用,并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学术界广为流行,但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全球化的起步要早得多,几乎与“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与“地理大发现”同步。无论我们对全球化持什么态度,全球化作为一种事实、作为一种历史趋势,都在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观念和思维方式。全球化正在对社会和文明形态进行大规模重构,全球化扩大了我们的知识视野,深化了我们对自身本质的认识。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所陈述的那样,1500年左右引起欧洲扩张的“地理大发现”,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全球观念,地球第一次以一个完整的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世界比人们原先想象的更大。如果说在这之前文明主要是在欧亚大陆展开的,那么,美洲、澳洲的发现与欧洲向非洲内陆的扩张,则开启了“第一次全球化”的浪潮,并在人类历史上掀起了一场“现代化”革命。“地理大发现”逐步推翻了传统的社会结构,改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念,推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加快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更重要的是,人们在地理空间上形成了全球性概念,“物流”与“人流”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碰撞与交流。

全球化在早期商业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血腥追求中逐步展开。同时,随着新时代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的出现,欧洲开始了漫长的“初级现代化”阶段,欧洲国家通过资源掠夺和奴隶贸易,建立了世界范围的“殖民帝国”。

18世纪下半叶,欧洲开始了“启蒙时代”。以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为标志,狄德罗、洛克、潘恩、卢梭、康德等一大批思想家阐述了启蒙的理想与原则,欧洲进入了快速“现代化”阶段。“现代性”的理念与制度逐步成型,“自由”与“民主”理念深入人心,自由民主制度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形式。此后的200多年来,人类文明的现代化过程,基本是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下进行的,“西方中心主义”逐成定势,西方的优越感、傲慢与偏见渗透到文明的方方面面,指导与左右着文明发展大势。

启蒙运动的最重要后果是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确立了资本主

义现代性的两个重要原则,即自由主义和民族国家。美国独立则在世界文明史上产生了一个新的、对文明发展走向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导致 100 多年后资本主义文明中心乃至世界文明中心向北美转移,大大拓展了资本主义文明在全球的影响力,对于稳定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现代化形式对全球的有效统治起到决定性作用。

自启蒙运动及法国大革命以来的 200 多年间,欧洲资本主义在自由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在科学技术与工业化的双重推动下,逐步形成了稳固的“社会现代化结构”。到 19 世纪末与 20 世纪初,经过 1880—1914 年 30 多年的“黄金发展期”,以英国为首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并在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下,诞生了一些新的“民族国家”。可以说,新旧世纪之交的欧洲在技术、工业等方面的优势处于世界顶点。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引下,欧洲几乎瓜分了整个世界,世界似乎正在按照“自由资本主义”的模式加速向全球化、现代化演进,欧洲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强大的“大殖民帝国”。

但在整个 19 世纪的欧洲内部,随着资产阶级在与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逐渐壮大并取得统治权,与资产阶级一起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并没有获得自己应有的权利,自由资本主义所许诺的民主原则、人民主权、个人自由等并没有实现,与之相反,由于工业化所引起的人口增长、城市化,使无产阶级陷入更为深重的苦难之中,无产阶级要求自由资产阶级进行政治变革的斗争此起彼伏,使得欧洲整个“19 世纪却是以政治镇压为特点。示威游行、暴乱、革命受到严厉镇压”^①。

但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资本主义的残酷本性才能充分展示,人们对“美好社会”的理解也才更深刻。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8 年 2 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反剥削、反压迫、追求社会平等、以“社会公正”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逐步形成,它充分揭露了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伪性”,认为在整个社会政治结构不公正的前提下,所谓自由、民主只能是少数人的专利。“社会公正”是一个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和最基本的政治制度安排,只有实现社会公正,个人的自由与民主权利才有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与以“自由”为核心价值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同,以“公正”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逐步形成,并成为后来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模式,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的世界,由于机电的广泛使用,现代化与全球化进入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人流、物流、资本流的流动速度进一步加快。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在全球迅速扩张,使过去以资源掠夺、奴隶贸易为特征的,具有“殖民主义”性质的自由资本主义,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资本主义大企业大公司争夺殖民地、开拓世

^① [法]德尼兹·加亚尔等:《欧洲史》,蔡鸿滨、桂裕芳译,海南出版社,2000 年版,第 467 页。

界市场以及国内矛盾的加剧,让位于以强权与扩张为特征的,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对世界的野蛮瓜分,导致了 20 世纪上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几乎使人类文明毁于一旦。

但 20 世纪的重要史实是帝国主义的欺凌与压迫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各自利益的战争,大大激发了弱小国家的民族意识,民族国家大批出现。更重要的是,1917 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实践,为人类文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框架”,使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理想第一次变成了人类文明的现实,从此以后,以“公正”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成为人类文明形态、社会现代化、全球化发展的一个基本选项。人类才真正开始面对产生于新石器时代、8 000 年前“农业革命”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即社会公正问题。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调,只有在“社会公正”的核心价值和制度框架内,才能有效地保障平等、自由、人民民主、社会共同体、博爱、和平等现代社会基本价值的实现。在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内,在一个没有实现“公正”的制度安排的社会,人类所具有的一些普遍价值只能具有理论意义,阶级社会产生以来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时刻都会毁灭人类文明的现有成果,或把人类带入无休止的争斗之中。

与 1500 年随着“地理大发现”所开始的、以“空间”为特点的、全球范围的物流与人流广泛流动的第一次全球化不同,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开始的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第二次全球化,则具有“即时性”特点,信息流与资本流可以瞬间传递到地球的各个角落,人类文明的现代化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地球真正变成了个“地球村”,国家之间、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加深。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大批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国家边界的确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对殖民地的资源、市场争夺开始寻求新的形式,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侵略难以为继,信息技术的发展完成了资本主义由“垄断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变,金融与货币工具成为现代金融资本主义“超国界”获取利润的主要工具。

可以说,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高度来看,当代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利用其在全球化过程中据有的经济、政治、道德、话语优势,主要表现为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在知识经济、金融经济、纸上经济、信息经济的幌子下,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贫困、榨取普通工人的血汗,并在其国内制造新的不公正;二是以所谓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为幌子,对别国、特别是弱小国家内政进行武装干涉,抬高政治道德嗓门、运用话语优势对其恶劣行径进行“道德辩护”,强调资本主义价值和意识形态是人类文明的唯一选择,并进而宣布“历史终结”和“意识形态终结”,似乎人类文明发展到现阶段,现代化、全球化只有资本主义一条路可走,但自 2008 年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终结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童话”,提醒我们必须对当代世界体系、对全球化、

对人类文明走向及现代化模式进行结构性地、深入地思考。

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下,普遍的人类福利并没有随着发展而提高,几组简单的常识性数据可以解释这一结论。1950年,南北国家居民的收入差距是1:10,而目前这个比例是1:30;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大约占全球15%的人口,占有大约70%的世界财富;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近期发生的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的各种“占领”运动说明,“不公正”也正在资本主义世界蔓延;从话语权来说,当代世界的“信息源”大约80%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基本左右了世界舆论。

自1500年以来,全球化与现代化结伴而行,曲折而复杂的人类历史画面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先是欧洲,随后是美国基本主导了这一全球化、现代化过程,无论资本主义的理论特点、社会形态、时代特征如何变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始终是这一过程的主导价值。

2008年爆发而延续至今的资本主义世界“全面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真正遇到了麻烦,其未来出路现在很难预测。同时,中国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在人类文明全球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日渐突出,如何在未来人类文明发展中突出中国的现代性特点和全球化价值,为文明发展提供不同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的“未来选择”,中国作为当代世界的一个重要文明主体负有重大责任。

三、现代化背景下“中国梦”的内涵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一直到18世纪,中国都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中国的技术和发明达到农业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但在18世纪,欧洲赶上并超过了中国,成为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技术推动的工业化、商业化使欧洲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快速变化,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向全球扩张步伐加快,主导西方文明发展的“扩张意志”和经济军事实力增强。

尽管如此,到1800年时,中国的经济总量仍占到世界的1/3以上,是当时世界上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人口也占到世界的1/3左右。但与技术含量高、工业化发展、生气勃勃、快速上升的资本主义经济相比,则明显“大而不强”。因此,乾隆末年的1800年,无论是从中西比较的角度,还是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而论,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转折年,文明发展的天平开始倒向西方,中华文明开始显现出衰败的迹象,由于种种原因中国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①

^①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中华书局,2006年版。

当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虽然我国GDP仍然占世界总量的20%左右,在世界11亿人口中占4亿,但当时仅有1000万人口、远离中国2万里的小小的英国,凭借“船坚炮利”仍然撞开了“老大帝国”的大门,使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境地,变成了资本主义的附庸、原材料基地和产品市场,封建官僚专制与殖民剥削的双重挤压,使中国社会基本失去了制度、技术、经济、文化观念等创新的动力与能力,中国被强行“被动地”拉入资本主义设定的“现代化”体系之中,固定成资本主义体系下生产环节的一个“初级链条”,内生性的、结构性的现代性因素难以成长。

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中国从此失去了基于传统结构的“社会稳定性”,进入了长达100多年的动荡期。其间,从魏源、林则徐等开始,直到孙中山、梁启超、陈独秀、鲁迅、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众多有识之士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进行了卓越的“现代性”思考和艰苦的革命与建设实践。其间,可圈可点的如洋务运动、维新改良运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解放区实行的以平等自由为核心的人民主体制等,都对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就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与意识形态,以及中国社会整体结构性特征而言,直到1949年以前,中国还处于“前现代化”阶段,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

从整个中国的“大历史”来看,我们认为中国社会的现代意识形态确立与社会结构性改革真正步入“实践性”阶段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1949年以后,中国开始了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具有社会共同体、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社会民主、社会自由等价值元素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奠定了迈入“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制度。尤其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走上了自觉、自主、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郑重宣告:“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丰富和开创现代化的独特内涵,从改革开放之初就是中国政府的目标和任务。

当然,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共和国建立以来一直不是很平坦。这首先是因为社会主义在中国是前人没有开创的事业,我们必须摸索着前进,出现这样与那样的错误在所难免,其次,对与资本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主义意识形态不同的东方社会主义大国的出现,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能反应就是封锁和围堵,直到现在,这种状况也没有多大改变,还是要求中国按照资本主义的模式实现“现代化”,差别仅是所使用的手段不同而已,再次,是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期,所参照的苏联“价值与制度摹本”出现偏差,也造成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走了许多弯路,最后一点也很重要,这就是“封建官僚专制文化”的传统影响。

可以说,自公元前3世纪结束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封建贵族专制”以来,随着中国的重新统一与郡县制在全国的推行,特别是汉代“独尊儒术”的封建意识形态固化和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形成,中国2000多年来一直维持着以“自耕农”为主体的、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封建官僚专制”的统治,期间虽然也有一些反复,如汉代的“分封制”、魏晋时期的“门阀政治”等,但都没有改变“官僚专制”的基本结构,“官本位”意识成为我们民族长期积淀的一种传统意识,“官府权力”决定“身份”的观念根深蒂固。这与欧洲国家的“封建贵族专制”“出生权力”决定“身份”的封建社会形态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的封建官僚专制统治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致使中国的现代化过程非常艰难,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很难实现。如果说欧洲社会在推翻了贵族统治以后,较容易重新建立社会的新的“权力结构”,而中国社会在赶跑了皇帝以后,可能的后果是:或者通过官僚实际掌握行政权力的中介“孵化出大大小小的新皇帝”,形成军阀或地方割据,社会的“权力生态”甚至更为恶化,人民群众更为苦不堪言,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统治基本就是这种状态;或者“新瓶装旧酒”,在光鲜的词汇掩饰下,承袭了封建官僚制的基本特权。即“身子”虽然进入了新社会,但“脑子”还留在旧社会,2000多年的封建官僚制下所形成的特权意识、官本位意识等还顽固地占据着一些人的头脑、左右着一些人的行为,使国家民族的现代化举步维艰。

因此,对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思考,既不能回到传统“儒学”寻找灵感,因为那是我国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表征,虽然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封建意识因素仍然很难消除;也不能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思路对社会进行结构性改革,因为那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思想反映。在当今世界,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在“社会公正”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以人民民主为基本制度追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一届政府履职以后,提出中国未来改革与发展的两个基本目标,即“中国梦”和“人的现代化”。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实现“中国梦”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和理想,就是要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建立一个每个人都有尊严和幸福的社会、一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社会”;“人的现代化”就是一个人的自主意

识、权利意识、民主意识得到充分合理表达的社会。

中国融入全球化浪潮,实行改革开放,只能是以自己的方式自主地进行,并在这一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鲜明性特征。只有这样,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才会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一次重要转折。我们之所以坚持以“公正”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对中国社会进行“结构性改革”,坚持“公正价值、公正制度”的文明模式,是因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普世价值”,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我们不认同以“自由”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体系的普世性,不承认其具有“终极价值”的特性,是因为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实践来看,“公正优先于自由”。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没有基本的社会公平正义,自由就是一句空话,社会民主、平等、博爱就不能实现。在这一点上,西方国家以“社会公正”为诉求的“占领华尔街”等社会运动,就证明了金融资本主义的“终极缺陷”。因此,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在当代文明走向出现极大困境的情形下,在推进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必须明确将“社会公平公正”作为中国梦的核心内涵,建立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权力结构和制度结构,这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也是应对中国当前社会结构形态剧烈变化、逐步步入风险社会挑战的必然选择。^①

第二部分 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社会结构形态研究

经过 30 余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社会中“人的自主性”不断增强,社会现实出现“复杂的多样性”,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急剧分化”,社会共识不断流失,社会发展的未来呈现极大的不确定性。能否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现阶段社会现实状况进行正确认知和解读,是明确“中国梦”价值内涵,重构与人类文明发展目的相一致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体系”的基本前提。^②

不可否认,与信息技术革命把整个人类文明带入“风险社会”相一致,中国社会的快速现代化也正在把我们带入一个“风险社会”,改革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强。正确认识阻碍改革与发展的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并通过深化改革消除改革阻力,使现实的不确定性中内含着一个确定性的未来,是我们当前极为紧迫的任务,也是明确“中国梦”价值内涵的基础。

^① 部分观点参见竹立家:《公正是社会秩序重构的底线》,《理论学习》,2012 年第 8 期;《期待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理论创新》,《人民论坛》,2012 年第 24 期。

^② 部分观点参见竹立家:《理性的改革逻辑何以可能》,《人民论坛》,2012 年 7 月。

一、不确定性、风险社会及其理论梳理

文明进程与发展经验表明:“不确定性”与现代化结伴而行,是人类社会在对“现代性”的苦苦追求中的一种“常态化趋势”,是当前文明发展“现实状况”在人们头脑中的正常反应。唯其如此,“不确定性”这一概念才成为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以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在哲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的概念。它的总的特点是对“现实的合理性”的一种思考、质疑和评判,并企图“确定”从“当前状况”中将要“演变”出什么,从而能对文明的未来或“合理的现实性”作出一个“确定性”的回答。

当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不确定性”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总危机”的一个正常反应或总概括。除了新自由主义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提出一个差强人意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并成为“实践样本”以外,后现代主义者们基本是“破坏”多于“建设”,对“不确定性社会”的来临无能为力,几乎没有提出“像样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

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目前也遇到了大麻烦,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普遍的经济危机而陷入窘境,加深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认识,对文明未来的悲观主义预测成为社会的普遍心态,人类急需知道一个确定性的未来。

其实,早在 1986 年,熟悉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德国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首次提出“风险社会”这一概念,但由于新自由主义在欧美社会风头正健,影响不深。直到 1992 年该书在英国出版,才引起广泛关注,特别是随着英国布莱尔工党政府的上台,为风险社会理论的流行奠定了政治和现实基础,具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背景的、英国“风险社会理论”的代表人物安东尼·吉登斯甚至被称为英国工党政府的精神领袖,是英国工党政府社会改革的“思想库”,他基于“制度主义的风险社会理论”所提出的“超越左与右”“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所谓“第三条道路”理论,成为英国工党政府的改革纲领。

我们认为,“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是基于对“现代性社会”或当代“社会现实状况”的“不确定性”的一种界定,并企图在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制度演变的张力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或未来的“确定性”,贝克称之为“虚拟的现实性”。不确定性是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或内在品性。贝克认为:“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①

^① [德]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 页。

吉登斯认为,人类社会“由于现代性的到来而引入了一种新的风险景象”^①。其实,早在188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资本主义世界30多年的所谓“黄金发展期”“无约束的资本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弊病,就引起了当时的“先锋思想家”的关注,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这一时间段,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及随后的世界“冷战格局”的形成,引发了一大批思想家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深入思考,人们一改启蒙时代以来对文明发展进步的乐观情绪,“文明发展的风险”乃至毁灭成为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话题。启蒙以来作为思想基础的本质主义、历史主义、表象主义、目的论的“乌托邦”等思想原则遭到了根本的怀疑。人们逐步相信,社会的现代化与合理化所导致的不是自由的实现,而是自由的丧失,是价值与意义的丧失,是对民主化的恐惧。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的话说,与过去的人相比,“今天的人失去了家园,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生存在一个只不过是历史决定的、变化着的状况之中。存在的基础仿佛已被打碎”^②。

可以说,自从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以来,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是一个“价值丧失”“自由丧失”的“铁笼”社会似乎已成定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则称现代社会是“工具理性”的胜利,后现代主义则认为现代性社会陷入一条“历史的歧途”。

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文明造成的几近毁灭性破坏,促使人们对现代化状态下的人类文明发展进行了深刻反思,力求在不确定性的社会状态下,确定“风险社会”的根源,并寻找一条避免风险、通向未来光明社会的坦途。典型的如1944年给哈耶克带来世界声誉的《通往奴役之路》,他在对“极权主义”进行系统批判的基础上,提出“市场的自发秩序”加“适度的政府活动”的社会改革方案,这一思路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教条。在当时与《通往奴役之路》同样享有世界声誉的著作,还有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于1945年出版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该书的写作背景也同样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文明造成的伤害。为了寻找“极权社会”产生的原因,波普尔从“批判理性主义”的角度,在对历史上各种思想进行剖析的基础上,对“历史决定论”或“历史主义者”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建立在“目的论的本质主义”之上的、人类社会长期追求的“乌托邦理想”的社会改造方案提出质疑,主张“社会重建的零星工程”的社会改革方案,倡导一种不改变“历史趋势”的“社会工艺学”的社会改造理论。他说:“零星工程将采取找寻社会上最大最紧迫的恶行并与之斗争的方法,而不是追求其最大的终极的善,并

①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② [德]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